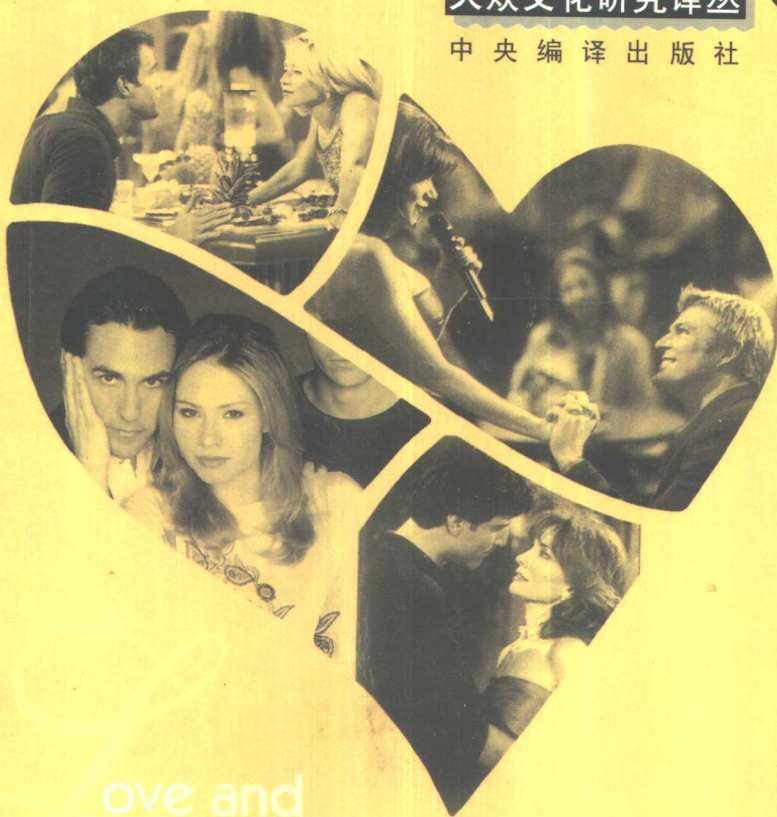


大众文化研究译丛

◆ 李 陀/主编

中 央 编 译 出 版 社



Love and
Ideology in the
Afternoon

午后的爱情 与意识形态

肥皂剧、女性及电视剧种

[美]劳拉·斯·蒙福德/著 林 鹤/译

大众文化研究译丛 ◆ 李 陀/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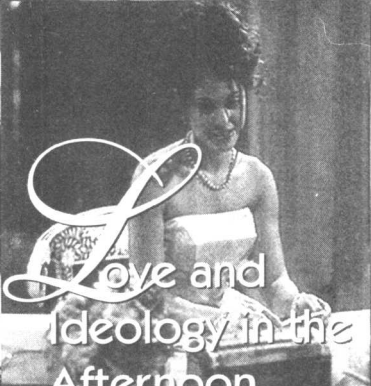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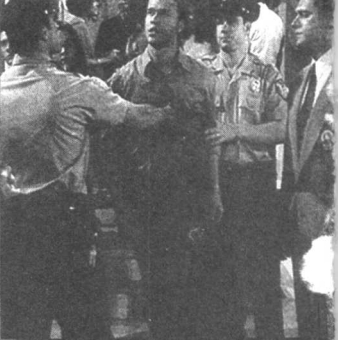
午后的爱情 与意识形态

肥皂剧、女性及电视剧种

〔美〕劳拉·斯·蒙福德/著

林 鹤/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策 划/王吉胜
李 燕
执行编辑/苏 元
李红梅
组稿编辑/王吉胜
责任编辑/周文海
封面设计/田 晗



序

李 陀

阿尔图塞对 20 世纪意识形态理论的贡献在于他发现了主体建构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的内在关系。在论述这个关系的过程中,他详尽地分析了国家、教会、学校、家庭和司法等机构在人的“自我意识”形成中所起的重要的“召唤”作用。他这一理论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现代国家和社会如何自我正当化的认识。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这两个概念的相对自足性,在阿尔图塞的质疑下都成了问题。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当中,特别是二战以后,由于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出现了种种阿尔图塞所不能预料的新的因素:商品和物的体系包围了人,并发挥着越来越多的意识形态功能。重要的是,与阿尔图塞所分析的国家、学校等机制的活动方式不同,当代意识形态的有效过程主要是通过日常消费的行为完成的。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正是以此变化为背景,一批被称为“伯明翰学派”的英国批评家开始了对当代文化批评的开拓,继而影响世界,使文化研究迅速普及于许多国家,并在 80 年代之后成为当前世界上最活跃的理论领域。

FL21/06

在阿尔图塞之后,英国的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等一批理论家,不仅对以往有关意识形态的经典论述进行了批判和分析,而且借此对大众媒体与国家、个人的关系,消费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等问题,都作了新的讨论和阐释,或者提出了新的理论。这些理论活动深刻影响了文化研究的发展。在一个新的批评视野里,以精英文化为主体的诸种文化现象不再作为分析和研究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主要对象,恰恰相反,这种分析和研究把注意力转向了被以往的理论活动所排斥或推向边缘的领域。大众文化,以及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的大众日常生活,诸如广告、时装、电视剧、畅销书、流行歌曲、儿童漫画、新闻广播、室内装修乃至休闲方式都成为理论分析和批评的主要对象。因此,文化研究不是我们通常字面上所理解的那种对“文化”的讨论,也不是在各种传媒学科的名目下发展起来的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传媒理论,而是特指近几十年以来,在英国的“伯明翰学派”推动下成熟起来的一种跨学科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涉及到20世纪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而且涉及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和新的结构性压迫的形成,涉及到它们和文化、经济生产之间的复杂关联。可以说,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人们对自己生活其中的当代社会进行反省和思索的一个最具批判性的认识活动。

近十几年中国最大的变革无疑是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在这一发展中,中国当代社会的变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多个层面,各个层面的变革又相互缠绕和渗透,形成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更可注意的是,有很多迹象表明,虽然还远不够富裕和发达,但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进入大众消费时代,特别是大都市和沿海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物的体系”对人的包围已经形成,商品消费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形式,同时,大众文化如洪水

般蔓延全国,广告、时装、流行歌曲不仅深入人的日常生活,而且成为亿万人形成自己道德和伦理观念的主要资源。这一切都不能不构成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面对这样一个历史情势,考虑到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正是大众文化以及与其相连的日常生活,考虑到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我们的文化生活因此也必然会与跨国的文化生产及其机制相互交叉,那么在中国开展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应该是很明显的。文化研究积累的经验和方法使我们不能不考虑,从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入手研究中国的社会变革是否可能?分析文化和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否是认识这个变革的一种有效途径?伯明翰学派以及其他国家的文化研究是否可以借鉴,成为我们认识中国现实的某种思想和理论资源?

除以上考虑外,文化研究还有其他使中国知识人重视的理由。

其一是它对20世纪知识分工过于细密的反动。或许有人认为今天知识分工或分类这样细致是知识自身发展的逻辑,这种看法就事论事,恐怕忽略了近代知识生产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今天批评、警惕西方知识霸权已经在中国知识界得到了相当普遍的认可,但是人们对当代建立在“学科”基础上的知识分类很少有批评,把这个分类系统当作无可置疑的给定的东西接受下来,很少把这系统同样看做是西方知识霸权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其实,一方面是知识分工越来越细,学科越设越多,各学科各领域之间鸿沟愈深,知识人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彼此被“行话”“行规”阻隔,谁也不知道谁在想什么、干什么;另一方面,对这种僵死的知识分工的批评在本世纪也从未中断过,许多批评者都指出,追根究底,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对科学技术的依赖和需求,迫使知识生产

和服从发展技术、发展经济的需要,并按照这种需要建立学科分工,划分知识领域,造成分类越来越细的现象。更严重的是,由于科学主义正是在这过程中建立了它的权威地位,人文知识领域亦不得不受其统摄,于是本来和自然科学知识是两股道上跑车的人文知识,也按照“科学知识”的分类模式进行了细密的分科和分工,由此形成 20 世纪知识发展的基本格局。不用说,这个格局对知识发展产生了一定积极的作用,但其阻碍知识发展的负面的作用也越来越被人所重视。马克思主义和 60 年代崛起的结构主义思潮,就都曾在抵抗繁琐的知识分工,强调从各知识对象的联系中对人和社会进行跨学科研究和认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近些年来,这种抵抗又由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等理论思潮的活跃而得到大大的加强。可以说,这是 20 世纪下半叶知识图景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变化,很可能将对下一个百年的人文知识发展起重大影响。是不是未来的知识,起码是人文知识会有完全不同的面貌?是不是隔行如隔山的学科分离会更进一步被打破?是不是跨学科研究会成为常规方法?这些当然都不好预测,但无论如何,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在各国兴旺起来,与人们试图寻找新的立场、方法和知识态度这种愿望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正是文化研究把这种愿望表达得最为强烈。

总之,无论从满足在中国开展文化研究的现实需要来说,还是从文化研究所暗示的未来知识发展的新的可能性来说,在中国较为系统地翻译、介绍国外文化研究的发展、现状及其代表性论著,已经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呈现在读者面前这套“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文化研究以关注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为其显著特征,但由于它非常重视理论方法,在它不很长的历史发

展中,它不但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等多种理论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而且还有一种互相影响、互相纠缠、共同发展的历史,所以理论性非常之强,远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简单明快。这给本套丛书的编选、翻译带来两大困难。一是翻译难,很多概念、提法和修辞都很难在汉语中得到相应的表达,除了经验和水平因素,译者们往往要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硬译”,这自然难免会影响译文的质量。编者和译者在今后会不断努力改进,但恐怕很难在短时间里理想的进步。再一个困难是遴选书目的标准。有关文化研究的理论著述太多了,到底何取何舍?我考虑很久,决定采取先易后难的原则,也就是先选一些分析、论述都比较具体,大半都涉及读者较为熟悉并有兴趣的电视媒体、时装、肥皂剧等文化形式的作品,然后再进一步介绍那些理论性更强的论著。这样做有个缺点,就是本来对了解文化研究更为重要的一些著作只能晚一些再着手译介了。不过,世界上许多事本来就难以两全,急也无用。

最后还要罗嗦几句的是,这套译丛中所介绍的著作当然都不是什么金科玉律,甚至其观点、方法会有很多不当或错误之处,因此它们只能是我们做文化研究时的某种参考和资源,不必迷信,更不能照搬。这在对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批评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的今天,应该不再是很大的问题。和国外理论建立一种批评关系,并在这种批评中发展自己的理论,理应是理论界的共同目标。

译者序

我的专业，不是文化批评，不是电视研究；不是英文，也不是中文。我只是爱乱看闲书。这本书的翻译工作落在我的手上，也只是爱看书带来的机缘巧合而已。既然自己是如此地不专业，那种正襟危坐的译者序便是硬撑着去写，想来也难以写好。倒是在翻译过程中时而有一些飘忽的感想，不妨写下来应付这体例的要求，也趁机拉住那些或许像我一样不专业的读者来谈谈天。

关于肥皂剧及意识形态

不仅我本人的专业和这本书的主题不相干，连我的亲友们也无一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听说我在和这么一本书周旋，他们百发百中地会有一问：肥皂剧是什么？我想，所有的非专业读者也会发此一问。

盖西方国家的小姐一旦先变成太太再变成了母亲，泰半就得留在家里料理家务，闷极发慌时便打开电视机，聊充与外界交流之一途。电视业瞄准这一稳定的观众源，每天下午专为她们放映一些啰哩啰唆家长里短的连续剧，里面的故事可以一直抻下去，几年之内天天不断地胡编不止。这些女士一边看这些痴人说梦的故事，一边洗洗涮涮地干活儿（用肥皂），因此这类专在下午档放映的长篇连续剧就得了一个恶谥曰“肥皂剧”。家庭主妇本就被人看轻，再加上她们收看肥皂剧时也是心不在焉，于是

乎肥皂剧的制作方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不求精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肥皂剧属于“文化垃圾”一类。然则1970年代以降,通俗文化大行其道,过去上不得台盘的种种居然成了新生代的时髦,收看肥皂剧的观众面在扩大不说,它的一些特征和制作手法也把黄金时间(晚间档或周末档)的电视剧给传染上了,以致有了“黄金时间的肥皂剧”之说。众所周知,黄金时间守着电视的可不单单是家庭主妇们(在中国大陆,主妇还不见得看得成黄金档的电视剧,彼时她正埋首厨房的水池里大力洗碗呢)。肥皂剧的影响波及了顶天立地(起码也是顶门立户)的男人们,于是,就有学问家来正而八经地研究它啦。

由于肥皂剧的观众群和播出时段都发生了变化,现在的学界在给它下定义时便比以往宽泛得多。据本书作者所言,它的定义如下:

一部肥皂剧是一出连续的、虚构的电视戏剧节目,每周安排为多集连续剧播出,它的叙事由错综的情节线索组成,聚焦于某个特定社群中多个角色之间的关系。

除此而外,作者还在第3章、第4章和第5章用了三章的篇幅,专门研究了肥皂剧的三个常见特征:曝光剧中角色的隐私公然成为重要的情节构成;就整出戏而言没有结局;借重于“生父情节”,描绘肥皂剧社群中纷乱的亲族关系。可惜的是,作者在书中谈及的许多肥皂剧实例,除《豪门恩怨》曾在我国中央电视台译制播出之外,其余为中国广大观众熟知的却寥寥无几(仅此一点亦足可表明,肥皂剧的艺术水准平平,故而不值得我们的电视台花钱去买回版权来辛辛苦苦地译制配音矣。不过,好像《豪门恩怨》的收视率是很高的)。即使《豪门恩怨》也不算一部“经

典的”肥皂剧,而只能算是“黄金时间肥皂剧”。所以看书里的例子,有时不免有点儿隔着布袋买猫的感觉。

那么,中国大陆有肥皂剧吗?从它最原始的狭义名称来看当然是没有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不必工作、专心做家庭主妇的观众阶层。不过,以上述新定义而论,倒也有一些剧目套得进去。其中,最先跳进脑海的就是当年造成万人空巷之盛况的《渴望》。它的情节基点就是一个“生父身份情节”——小芳的身世之谜;造成剧情纠葛的驱动因素也是剧中诸多角色之间错综复杂的恩恩怨怨。虽然刘慧芳那“超女人神话”式的贤德和苦难(基本上是她的贤德带来的苦难)让人头皮发紧,但是,至少从当时报章上的好评如潮来看,剧情所宣扬的意识形态观念确实获得了主流媒体的强烈认同。巧的是,这种意识形态也是极端压抑女性的。

《渴望》之外,第二个跳进脑海的——对不起,却不是电视剧——便是小说《红楼梦》。曹公地下有知当被气煞,然而诸看官且先慢替曹公跳脚。肥皂剧在西方的口碑向来是“女性化的文本”。众所周知的又一事实是,年轻小子爱读的古典著作,不是《三国》就是《水浒》,很少数得上《红楼梦》,因不爱它那儿女情长的调调儿也。反观女性,自少女至老姬,其不心仪宝黛湘者几希。

以本书的肥皂剧定义来套《红楼梦》,它不是“由错综的情节组成叙事”乎?没有“聚焦于特定社群中多个角色之间的关系”乎?抑不擅“曝光隐私”乎?不是“没有结局”乎(虽然这里的结局缺席不是作者的选择)?贾府不是“亲族关系乱七八糟”乎?甚至于肥皂剧衍生了以剧迷杂志为代表的“肥皂剧文化”,《红楼梦》也毫不含糊地养着个“红学”。

在此,我不是要把《红楼梦》诬为“文化垃圾”(我亦是“红迷”

之一员),而是说,“肥皂剧”研究的意义不见得仅限于狭义的肥皂剧范畴,它的成果也可以举一反三地启发我们,换一种角度去重新审视我们烂熟于心的其他文本,重新审视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文化安排,重新审视我们“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接受下来的意识形态观念。现在流行的是讲究“纯艺术”,以往那种“讲述了……歌颂了……弘扬了……”的规则似乎日渐式微,然而,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立场仍是无法视而不见的。即以我们一度以为非常自由化的美国影视而言,近焉者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急诊室的故事》(Emergency,简称ER)至少已经在北京有线电视台播放过两轮,每次占用的时段都是晚至22:45左右才开始。两轮播放期间我都一集不落,因为这部戏着实好看。它讲述了一个小小县立医院的急诊室里的医患众生相,歌颂了救死扶伤仁心仁术的白衣天使,弘扬了人道主义精神,是一个非常“主旋律”的制作。而且,它在美国年复一年没完没了地得艾米奖(相当于电视界的奥斯卡),说明它的艺术水平也算不错。ER并未把剧中的医护人员偶像化,每个人都会面临重大抉择或人生困境,也会不断地犯错误。我们不妨仔细回想一下,剧中的主要角色们在这种关头的所做所为。只有格林医生和苏珊·刘易斯医生,两个纯正的白种人,犯过的错误纯属技术性的,而与个人品质无关。这两位医生的人格似乎是完美的,经常还要为别人的过错受点儿委屈。专业精良的黑人外科医生本顿就逊色许多,他只对病症感兴趣,不但对病人的心理要求不屑一顾,还嘲笑关心病人情绪的(白人)医学院实习生卡特。本顿遇到问题的第一反应,就是对着别人大吼大叫,毫不检讨自己,无论对方是上司、同事、学生还是家人。还有一个亚裔的实习学生埃米就更糟糕。她虽具备了相当优秀的专业能力,却汲汲于个人得失,为

争得更多的临床实践机会费尽心机,擅自手术失误之后则一溜了之,甚至于根本放弃了继续从医的志向。重要的是,西方社会近年来所谓“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的声音非常之强,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条准则就是不得歧视少数族裔。在此语境中,ER仍把不良倾向都分配给了有色人种角色,可见白人至上的观念是何其根深蒂固,已经成了下意识的反应。

另一个例子是电影《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也很好看,虽然有自然写实的血腥场面。在北约轰炸南联盟之前,我们的媒体对这部电影的反应是一片赞扬之声,我所见到的惟一例外是《南方周末》上登载的龙应台的文章:《感动,谁的商品?》,她提醒大家对动人故事背后的文化灌输保持警惕。随后不久,就有其他文章反驳她,指责她竟对“人性”、“人道”、“人的生命至上的价值观”毫无感应,还暗示了她为德国鬼子鸣不平,犯有立场错误。天知道,“美国的”就是“西方的”,也就是“正确的”,难道说媒体已经把我们的脑子洗到这么“纯粹”了吗?

就在我翻译本书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连续剧《雍正王朝》,又是一出好看的戏,而且做的是翻案文章。令我震惊的是,翻来翻去唱的仍是天子圣明臣罪当诛的老调。看着由皇子而皇帝的雍正殚精竭虑为天下黎民呕心沥血,简直觉得我等草民着实是圣上的累赘,惟一能帮上点儿忙的就是杀身以报啦。更加夸张的是伴着片头字幕和“数英雄论成败”的歌声而闪过的镜头。有心人不妨统计一下,在这短短几分钟里放映的、从长达20集的故事里选出来的,一共有多少个不同的镜头,其中有多少是下跪的场面。皇帝跪苍天,王子跪皇父;好官感动得跪,贪官害怕得跪;阴沉着脸跪,哭天抢地着跪。看着这种镜头长大的孩子,可能有真正的站立意识吗?

以上谈及的三部作品,均是严肃认真的制作,绝非拆烂污的

电视垃圾可比。哀哉。

当代理论界爱说的一句话是,“不是你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你。”纪德的小说《田园交响乐》其实描写的便是这样一个原型故事。牧师家收养的盲孤女沐浴着爱意长大。牧师带她去听贝多芬的《第六交响乐》,告诉她,某种乐器的音色像白色,某种乐器的音色像红色,某种乐器的音色像天空的湛蓝。盲女于是对世界的五彩缤纷有了感性的认识。想像一下吧,别人形容给你听的世间万物都化作悠扬的乐声融为一体,那种感受不是天堂一般吗?不幸的是盲女经过手术复明了。她看到,这个世界并不是牧师在她心中搭建的那个天堂,人与人之间不仅有爱,还有怨恨、嫉妒和疑忌,连她的再生之父牧师也不是她心目中的样子。她的全副精神力量彻底崩溃,“我看见了,我就死了”,她死了。

我们正常人始终浸在滚滚红尘里,绝不会和这个盲女一样纯真,也就很难走到这种彻底幻灭的绝境,但是次焉者的幻灭总会碰上些许。对别人灌输给你的东西保持警觉,应该是守住清明理性不可或缺的要务,鲁迅先生把这叫作不要让别人在你的脑子里跑马。身为女性,最难逃避的,应该包括“由文化教养建构的女性意识”。因而,本书的一个立论重点,也是让我感触至深的,就是对以肥皂剧为代表的媒体作品进行的女性主义分析。

关于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者,以前之“女权主义”也。我最早知道有女权主义一说时应该还在念中学,那时,这个词开始出现在国内的报章杂志上。它代表的形象是,西方社会一些怪诞的女人,故意显得粗鲁、难看,像男人一样抽烟、喝酒,争取的目标是反过来骑在男人头上欺压他们。这种潮流让我很反感。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向来是很唯美的人。不论出于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目的,故意

自毁形象,在我看来,也是很下焉者的做法。(单凭这一点亦可看出,传统的女性角色训诫在我身上是何等地奏效。)另一方面的原因也许更加重要:中国向来提倡“男女平等”,对一个十几岁的女学生而言,实现和男同学的平等却是太容易了。因此,我并不觉得还有必要再去争取什么。我想,我的这种感觉是相当有代表性的。中国女性的地位被政治化地硬性拔高了。目前40岁以上的女性当中,事业上获得成功的人数比例较之于西方的数字要高得多。尽管成年女性在许多方面仍能发现受压抑之处——如福利分房时,有些单位明文规定女职工不在排队申请之列;以及在夫妻双方均有工作的情况下,家务劳动仍然主要压在女方身上,就是两个最明显的常见例子——但总地说来,自1949年直至1980年代,中国女性享受着较高的平等待遇,却并未为此亲身经历过像西方女性一样艰难孤立的斗争,因此对生疏的女权主义态度冷淡,这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1980年代以来,市场力量渐起,中国女性的地位在不声不响地悄然回落。出现了娼妓现象、情人现象也就罢了,前日我竟看到报上赫然有良家妇女的宣言在焉:如果丈夫挣得到足够的钱,我当然愿意在家不上班。要知道,有哪个女人是真心喜欢工作的呢?(载于《精品购物指南》报)无独有偶,针对当前下岗工人太多的局面,竟有经济学人出谋献策曰:下岗男工不发失业金,下岗女工发双份的失业金,以此鼓励女人留在家里“提高家庭生活质量”,不再寻求就业,于是就可以缓解就业市场的压力(对此《北京青年报》和中央电视台的“半边天”节目都曾有过报道)。呜呼,一叶落而知秋。忝为女性,见此能不毛骨悚然吗?

赤裸裸的主张之外,另外还有一些“教诲”要温柔蕴藉得多。报上有一则书目广告,推销的是经济日报出版社的《给女人最渴望的——如何让你浪漫一生》,广告词曰:“无论世界怎么变化,

有一点却永远历久弥新,那就是女人对浪漫的渴望。……其实,女人渴望的不过是一个能在日常生活中带来浪漫的男人……就像魔术师可以凭空变出鸽子一样,一个浪漫的男人能随时随地创造出一种气氛,只是为取悦她。”多么美丽的梦境啊,但谁说的“女人最渴望的是浪漫和浪漫的男人”呢?谁又见过有人说,“男人最渴望浪漫”?凭什么只因为性别的差异,就决定了人生理想有如此巨大的差异?一个女人,首先是一个人。一个人首先必须能够独立生存,能够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非此亦不可称女人,那叫玩偶。针对上述广告词,我想,最简单有效的一帖解毒剂就是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那个渴望浪漫的女主人公爱玛·包法利最后是饮毒自尽的,不是为了殉情,而是欠了巨额债务,简直煞风景。

前些日子,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上了畅销书排行榜,这当然是件好事。她在书中说过,“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建构出来的。”读此书时,我常会感到德·波伏瓦在半个世纪前写下的文字至今仍很贴切,也不知该为她的洞察力烛照中西而浮一大白,还是该为女性的境遇改善之难、为女性的进步之难而偷洒一滴泪。

由于有了这些感受,我强烈地希望,凡是女性,无论是不是“专业人士”,都抽空来读一读本书。不必句句细读,也不必处处求懂。亲戚朋友同事之间,十几二十人传看一本书,单抽取其中比较具体有趣的例子看看便可。比如说,女性“年轻瘦削”的审美标准是传媒业和美容业携手推销给我们的。比如说,事业成功的女性,其爱情生活一定不幸福,也不能由成功的事业加以弥补,这种信念是无数的电视情节反复训诫出来的。比如说,性关系上呈主动姿态的女性都是“妖妇”,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常常要操纵和欺骗他人,这种角色定位也是肥皂剧要夹带过关的价

值评判。有些事情或许我们本不经意,一经点破方恍然大悟,觉得自己以往轻信的种种琐碎的“女性准则”是何等地人为而荒谬。所谓的“父权制意识形态”,的确早已潜移默化地成了我们呼吸的空气,而且还教会了女性也来 enjoy it,一同维持这种现状。如前所述,就有不少驯良的女性觉得能被人“养”起来是至高的幸福。这种心态不消除,这些“障”不扫清,女性将永远沦为第二性。

关于翻译

翻译本书,固然常有与作者会心处婉然微笑乃至于击节大笑的美好时光,但也有非常多疾首蹙额的苦恼。主要的症结仍是由于我不是专业人士。近年来有一些新译过来的书,读来常会有很“隔”的感觉,因其“翻译腔”太重之故。对此我的感受就像面对着一盘美味的炒蛏子,可惜它没有洗干净,每吃一口都要就着齿颊留酸的沙粒。然则蛏子本身着实鲜美,不可不吃。这种窘境比起鸡肋来可就愈发地窘了。

尝过别人炒的蛏子,初接本书便暗下决心,我可得把“沙粒”洗净了。可是,如今要交差时,我不得不惭愧而悲哀地承认,这仍是一盘“沙粒炒蛏子”,而且沙粒一点儿都不见少,翻译腔固仍旧挥之不去也。

本书的第2章和第4章是专业性比较强的两章,译出来也最为佶屈聱牙。文化批评要入大众的闲眼,它的先天不足在于非常生活化的东西被理论化了。所以,我等“化”外之民看见这种东西,乍一眼还觉得没什么难懂,再看下去就愈来愈临“本”涕泣不知所云。遇到叙述性较强的章节,尚可以把作者的长句子拆碎,代为腾挪;但是它变得“拽”起来啦,我就只好死在句下。这是我学力不逮,最对读者抱歉的地方。